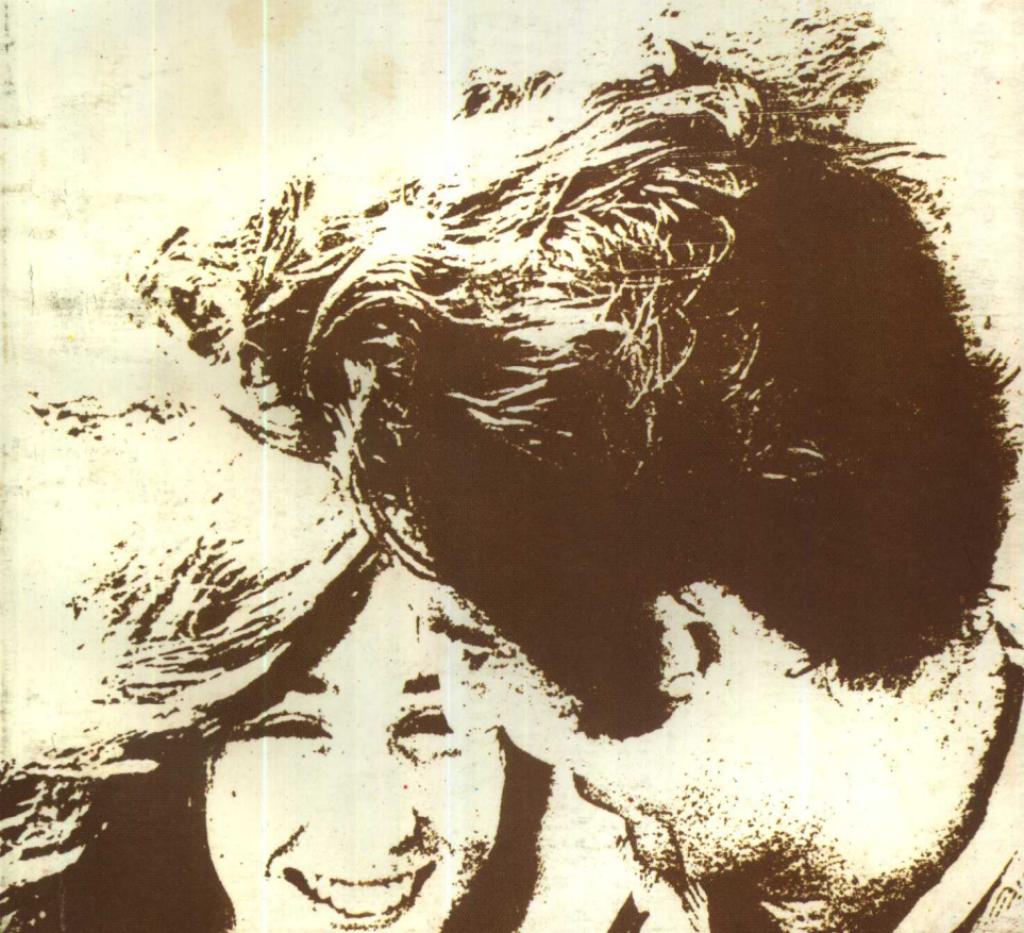


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我 们

[苏] 札米亚京 著

余丹 阿良 译



我 们

〔苏〕札米亚京 著

余丹 阿良 译

花城出版社

我　　们

〔苏〕札米亚京 著

余丹 阿良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3插页 170,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平装印数1—4,270册

ISBN 7-5360-0433-8/I·400

平装定价：3.90元

编者的话

本书是跨俄苏两个时代的作家札米亚京于1921年写成的政治寓言小说，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崇高声誉，但在作者的祖国苏联一直被作为禁书，直至1988年才首次解禁出版。

小说描写未来一个科学发达的名为“唯一国”的人类社会，它生活安定，人的生育功能由工厂替代，幸福由领袖“至高恩座”赐与，而为了维护社会这种“先进”性，必须取缔一切自由倾向及人类珍视的一切感情因素。一个没有“我”，只有“我们”的扭曲了的社会被作者刻画得淋漓尽致。

由于作品的深刻寓意，本书被公认为20世纪“反面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但作者的遭遇却极为不幸，其作品被禁止出版，作者本人被迫避居国外，最后客死巴黎。

本书还收入了作者致斯大林的一封信，以及著名学者的评介、作品版本说明等资料。

“反面乌托邦”作品兴于本世纪，我们出版此书，旨在向文艺工作者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读物。

论《我们》 ——“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的奠基作（代序）

薛君智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苏联作家札米亚京的小说《我们》在世界文坛上被公认为：“反乌托邦小说体裁中的经典性作品”^①。

关于作品讽刺的那个乌托邦究竟具体地针对什么，曾经是众说纷纭。1932年，札米亚京本人在谈到《我们》的构思时指出：“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和国家的过大权力的威胁。几年前美国人在谈到我的小说的纽约版时，并非毫无原由地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福特体制^②……”^③（注：重点为

① A·谢因，《札米亚京的生平与创作》，第230页，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58年。

② 指为加强经济效益，迫使工人加速劳动强度的一种体制，在美国最早应用于福特汽车工业集团。

③ 转引自《莫斯科新闻》，第9期，1988年2月28日。

笔者所加）。札米亚京说得很清楚：他所反对的乌托邦意味着既由于工业科技的迅猛发达、又由于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所导致的极权和专制。

札米亚京讽刺极权主义的主题思想在《我们》中体现为一系列的矛盾与对立：“唯一国”与绿墙外的自然界、机器与灵感、自由与“幸福”、性事表与爱情、理性与灵魂、熵与力、尽数与不尽根($\sqrt{-1}$)、吨与克、一致与反叛、“我们”与“我”……。小说主人公只能在这无数对矛盾中二者必择其一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男主人公D-503经过迷惑、醒悟、犹豫、徘徊后，摆脱不掉“那自古以来人类就有的不自由意识”，被迫回归到原来的状态，他的“我”无能反抗代表“我们”的至高恩座。但女主人公E-330则与之相反，她坚信“无限革命”的辩证法，热爱力而贬弃熵，直到被关进钟形玻璃罩受刑和将牺牲在至高恩座的杀人机器中。然而，从小说的结尾可以看出，作家的思想并不悲观。首先，回归原状的D-503在观看E-330受刑时，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了那坚强女子的尖利白牙非常漂亮，这一细节暗示至高恩座强迫他接受的摘除幻想的手术，并未能消灭他的回忆能力，净尽人的内在个性。其次，小说结尾，根据D-503的札记，绿墙西部边界已经倒塌，反叛的混乱依然存在，这说明专制暴君对人身外部的设防也仍旧有漏洞。由此可见，作家虽然用了“我们”作为小说的标题，而他的同情、信心和期望却是在“我”的一边；维护和保卫与极权主义相抗衡的人道主义、个性自由、人性完美——这就是札米亚京通过他的反乌托邦小说所要表达的主观愿望。

札米亚京称自己为艺术上的新现实主义者，在《我们》

中，它主要体现在作家通过精心刻意的用词遣字，从而达到语言的视觉性效果。例如，对每种颜色赋予象征性的含义：红色代表热情与革命，是力量、能源、反叛、爱情的象征；黄色象征阳光和生命，以及特定环境中与古代自由世界相联系的事物；蓝色是冷冻和理性、平静寂极的熵的代表色；白色基本上是无生命的标志；绿色介乎黄蓝之间，主要用于描述自由的植物与动物世界……札米亚京对于语言视觉效用的重视和对于色泽的挑选，不仅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观点，而且也受到与他同时代的二十世纪初欧洲印象主义画家们的影响。

在《我们》中，为了加强语言的形象化，作家还运用了另一些意象体系，如将人物的思想、行为、动作与金属、液体（以水为主）、阳光相联系。为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几乎完全回避了长篇大论的阐述，而是更多地有组织地使联想、印象、形象发挥作用。同时还使用札记形式、剪辑性的电报文体、迅敏的省略号等来表达理性主义化的思考。最后，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札米亚京在这部小说中所创建的反乌托邦小说的两种结构模式：一是通过中心人物（往往以日记形式）的自叙，围绕他本身的遭遇展开情节主线；二是插入一个反叛的故事来加强作品结构的戏剧性，并借此插曲深入展示乌托邦社会的面目和加强人物性格的刻划。

札米亚京创作《我们》所采用的讽刺幻想小说体裁，既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遗产，也延续并发展了西方反乌托邦文学的传统。

在俄国古典文学遗产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札米亚京创作《我们》的影响更为直接、深远。小说中描述到D-503在听完

至高恩座关于维护“唯一国”利益的种种论证后，不禁想起陀氏的名著《卡拉玛卓夫兄弟》中宗教法庭庭长的故事。札米亚京的这一笔点触，绝非偶然。伊凡·卡拉玛卓夫告诉兄弟阿寥沙说，宗教法庭庭长斥责基督拒绝将人的自由换成撒旦所提供的权力，他所设计的未来中，十分之一的人掌握权力，十分之九的人虽被剥夺自由、却可享有“幸福”。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位宗教法庭庭长和札米亚京的这位“唯一国”的至高恩座，具有着同样的统治原则和幸福观：在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下，赐与多数人以没有自由的“幸福”。

《我们》明显地继承了西方、尤其英国文学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的科幻幻想小说创作传统。1920—21年时，札米亚京曾为高尔基主持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编辑了三卷集的威尔斯文集；1924—26年间编完威尔斯文集十二卷。他并曾于1921年根据自己的演讲报告写就两篇关于威尔斯的论文。札米亚京对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和社会幻想小说创作评价很高。

在《我们》之后，世界文学的园地里又出现了另两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即阿道斯·赫胥黎①于1932年发表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乔治·奥威尔②于(1948年写成)1949年发表的《1984》。这三部小说组成了闻名于世的“反乌托邦三部

① A·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天演论》作者汤姆斯·赫胥黎之孙。1940年移居美国。《美丽新世界》以辛辣的讽刺，对现代科学给人类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灾难作了悲观的预言。

② G·奥威尔(1913—50)，英国小说家。早年反对帝国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1936年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斗中负重伤。以后右倾，鼓吹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作有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农庄》(1945)和幻想小说《1984》。

曲”。在三部曲中，札米亚京的《我们》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三部作品的主题思想都没有离开札米亚京构思的总体范围，即“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和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其次，札米亚京为《我们》所设计的故事情节模式——以中心人物的遭遇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以及插入一个反对乌托邦当局的叛逆故事以加强作品结构的戏剧性——就基本上体现在《美丽新世界》与《1984》中。D—503与E—330的爱情故事，在柏纳·马克斯与雷宁娜·克朗以及温斯顿·史密斯与裘莉亚的命运中得到十分相似的重现。最后，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也大致如此。《我们》中的至高恩座、《美丽新世界》中的穆斯塔法·蒙德元首阁下以及《1984》中的老大哥，不都是推行极权主义的专制暴君吗？而札米亚京笔下的“靡斐”、赫胥黎的“蛮族保留区”中的野人以及奥威尔的“无产者”们，则都是虽生活在原始状态，却又是维护个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代表。

诚然，由于每个作家所处的社会、时代不同，个人生活阅历各异，三部作品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区别。

赫胥黎曾声明说，在写作《美丽新世界》之前，他没有听说过《我们》。而札米亚京在1932年读到《美丽新世界》时则指出：“……很有意思的是，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在他最近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发挥了和《我们》中所包含的几乎同样的思想和情节布局……”札米亚京的这番指明并非暗示赫胥黎有摹仿之嫌，因为他紧接着这几句话后又立刻强调说：“这种吻合证明这种思想（注：指极权主义的威胁）存在于我们的周围”^①。这就阐明了两位作家所以产生相同危机感的客观原

^① 转引自《莫斯科新闻》，第9期，1988年2月28日。

由。然而，尽管两部作品基于这种危机感而具有模式相同的主要思想，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美丽新世界》强调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作者所否定的“完美”，也正是针指科技领域中的发明和创造。它与《我们》的区别正表现在这里。《我们》所讽刺的乌托邦同时象征着经济（“机器”）和政治（“国家”）的极权主义；而赫胥黎偏重和强调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即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危险性更令他担忧不安。如果说，在《我们》中，札米亚京对科学发明的描述并没有赋予重要的价值，他的乌托邦主要依靠他作为造船工程师所熟悉的数学与工程学知识来加以构想。那末，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的故事则主要凭藉他所掌握的“足以基本改变生活质量的生命科学”——来筑造他的乌托邦世界。

奥威尔的《1984》与《我们》在讽刺“国家”的极权主义方面更为接近。奥威尔承认读过《我们》的法文版，并对之倍加赞赏。由于奥威尔亲身见闻过三十年代斯大林的专制与苛政，以及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凶残与暴虐，因此他所构筑的那个象征极权主义的——“大洋国”，比起《我们》中的“唯一国”来，更接近于现实，也更为可怕和令人惊惧。而《1984》的结局，则自然要比《我们》和《美丽新世界》更为悲观和暗淡。奥威尔笔下那个已成为“行尸走肉”的温斯顿·史密斯，虽生犹死，还不如赫胥黎那个虽以绝望的自杀告终、但却保持了人性的“野人”。而与札米亚京那些坚强的叛逆者们和自由地生活着的原始生物相比，就当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札米亚京显然基于他所信奉的“辩证法”哲学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世界、对人生的乐观主义态度，能够采取幽默性的讽刺来蔑视、来嘲笑《我们》中的那个“唯一国”，笔调既尖锐、锋利，又轻松、自

如。相比之下，《美丽新世界》过多耽于科技细节的描绘，因而读来沉闷一些。《1984》则因对专制暴政的渲染，偏于强调毛骨悚然的效果。相比之下扎米亚京所运用的印象主义风格，似乎就显得更有趣味。

初稿 1988年8月12日于青岛

完稿 1988年9月9日于北京

目 次

论《我们》——“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代序）	薛君智	(1)
我 们	[苏] 札米亚京	(1)
	余丹 阿良 译	
附一：札米亚京致斯大林的一封信		(235)
附二：关于《我们》的版本		(240)
“异教徒”作家——札米亚京		
	薛君智	(243)

我 们

〔苏〕札米亚京 著

余丹 阿良 译

札记之一

一项声明
最聪明的线
一首诗

今天的《国家宪报》里有下面这么一段话，我现在逐字把它抄下来：

一百二十天后全能船就要建成。伟大、历史性的时刻快来临了，第一艘全能船将直冲太空。一千年前你们英勇的祖先驯服了整个地球，建立了大一统的唯一国。现在你们有更光辉的事业要做：就是利用闪光、发电、喷火的全能船，把全宇宙统摄征服过来。你们要把一切未知的生物征服于理智的有益枷锁之下——这些生物生活在别的星球上，也许仍然处于野蛮的自由状态。如果他们不能明白我们是要带给他们数学上算来是绝对错不了的快乐，我们就有责任强迫他们，令他们快乐。但是，在采用武器之前，我们应尝试运用语言。

现在我们奉至高恩座之名向唯一国的所有号码们宣布：
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有能力，都应该创作论文、诗词、
颂歌或其他类作品，来歌颂唯一国的美丽和伟大。

全能船将载着这批作品启航。

唯一国万岁：所有的号码们万岁，至高恩座万岁！

我一面写，一面两颊飞红。是的——我们必须贯彻这项任务，把全宇宙统摄统一。是的——我们必须把狂野的弧线拉直，把它从弯曲之状扯成直线！正如唯一国的路线是一条直线一样。直线是伟大、神圣、准确、智慧的——是最智慧的线。

我，D—503，参与全能船的建造——我只是唯一国众多的数学人员之一。我的笔只习惯书写数字，不大能够创作谐调的韵律。我只能尝试纪录我所看见的和我所想的——准确点说，我们所想的（就让这“我们”作为我这束札记的标题吧）。不过，我所写的将反映我们的生活，也就是唯一国里按数学上来说是完美的生活，所以不管我写的是不是诗，难道这本身不是一首诗吗？这将是一首诗——对此我确信无疑。

我一面写，一面两颊飞红。也许我现在经历的就像一个女子第一次感觉体内有新生的胎儿一样，尽管它极小，且盲目，但有脉搏在跳动。它就是我，但同时也不是我。月复一月我将要用自己的心力、自己的骨血来滋养它，然后，经过极大的痛苦，让它脱离自己，把它奉献在唯一国的脚下。

但我已准备好了，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或差不多每一个人）已准备好一样。是的，我准备好了。

札记之二

芭蕾舞 正方形的和谐

X

这是春天。从绿色大墙以外，那看不见的蛮荒平原上，风送来了某些花儿带着蜜糖的黄色花粉。人的嘴唇让这花粉弄得怪干的；每分钟你用舌头舔一下嘴唇，而很有可能你碰到的所有女人的嘴唇都是甜甜的（男人当然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想法会干扰逻辑思维。

可是，你得看，那是怎么样一个天空啊！蓝蓝的，不带一片云（古代人的趣味也真原始。他们的诗人竟会对那些荒谬、歪斜、笨拙的层层水气产生灵感）。我只爱眼前这个天空，消过毒的，一尘不染——如果说我们都只爱这个天空，也肯定错不了。在这种天气里，整个宇宙就像我们的绿色大墙和所有别的建筑物一样，都是用同一种坚固永恒的玻璃铸造成的。在这种天气里，你会看到事物澄蓝的深度，看到它们的问题，直至那一刻它们还是那么令人迷惑和不了解——即使在一些最普通、最平庸的东西里，你也看得出这些问题来。

就拿这个作为例子来看吧：今天早上我到了正在建造全能船的发射场上——我突然看见了那些施工架。那些圆球形的调节器盲目地、不自觉地旋转着；那些闪闪发光的转动的曲